

经济、民主与稳定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

傅 明·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历史时期的运用与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发展经济、建设民主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在这方面的论述是他的治国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对指导我国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大发展。

发展经济、建设民主需要稳定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因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②我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又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问题,尤其需要特别努力地发展生产力。

为了使我国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③“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④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⑤而发展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总目标之一。他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⑥

如何才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顺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呢?邓小平指出关键是稳定。“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⑦“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⑧

什么是稳定的政治环境呢?所谓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指国家政治系统具有权威性、连续性、秩序性,其中政府系统功能健全,政令畅通,能够有效地驾驭整个社会,使社会生活纳入现有政

治体系的法制轨道。与政治稳定相反的是政治动乱。政治动乱意味着国家政治系统不能有效地控制整个社会,社会的诸多活动超出了政治体系的法制轨道,政府的局部、或者全局的目标被迫转移,原有的工作秩序被打乱,乃至造成政府组织的不同程度瘫痪。

显而易见,要想使我国尽快地摆脱贫穷,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顺利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避免政治动乱局面的出现。因为政治动乱的出现就意味着:

第一,政府和全社会转移局部乃至全局的目标,不可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二,政府无法有序地调控市场经济,使其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既要自由发展又不能离开政府调控绝对自由发展的经济,而政府的足够权威,是保证政府对市场经济能否有效调控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一条,再好的调控政策也是空的。

第三,动乱本身就意味着对市场经济的破坏。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破坏法制的动乱也就是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轨道、运行秩序的破坏,也就是对市场经济的破坏。

第四,动乱本身也意味着对民主的破坏。民主政治是法制政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不歧视少数的一种政治制度。如果人们脱离法制而为所欲为,那就是否定法制,也就否定了民主。

第五,政府无法顺利地领导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⑧,“改革有很大的风险”^⑨。改革不比革命更容易,它同革命一样需要秩序和纪律,需要建立领导者的权威。这首先是因为虽然改革不象革命那样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变化,只是某些具体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化,但革命的目标明确、清晰,改革的目标比较难以确定,比较模糊。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要求领导者有更高的辨别力、选择力。其次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⑩。改革的目的是使公民普遍受益,但具体到某项改革措施,可能又损害某些公民的利益;而革命却只损害革命对象的利益,所有的革命阶级及其分子都是受益者。因此革命的动力、阻力阵线明确、确定,而改革的动力、阻力不完全明确和确定,每个公民都是改革的拥护者,又可以是某一项改革的反对者。这种不确定状况,给政府推进改革增加了很大难度,它要求政府非常慎重地考虑每项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条件。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改革因反对者太多而受挫,使经济发展、民主进程受阻。改革的这些特殊难度,要求政府和全国人民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共同去总结经验,从中找出最优的改革战略和策略;要求有一个政令畅通、运转自如、高效灵活、有足够权威的政府系统去贯彻执行这个最优的战略、策略。而这些,都需要政治稳定。

我们说的发展经济、建设民主需要的政治稳定,是真正的政治稳定,是与生动活泼相联系的政治稳定,决不是死水一潭、毫无生气的僵化式的政治稳定。邓小平曾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指出:“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生动活泼也来之不易,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者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应该有矛盾”^⑪,指出我们“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⑫

邓小平所说的安定团结与政治稳定的含义基本上是相同的。他将安定团结与生动活泼联系在一起,并提出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们没有矛盾。因为只有生动活泼的安定团结才是真正的安定团结、真正的政治稳定。这个政治稳定是建立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人们在法制的轨道上,自由地、心情舒畅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政府决策,监督政府执行;在法律规范所容许的范围内,人们可以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斗争;政民之间通过法制渠道,双向沟通,互相支持与合作等等。通过这些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人们真正感到政府是自己的政府,自然产生对政府的亲切感、认同感,从而真正出现一种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政治稳定局面。相反,如果离开

了生动活泼,只能是强制的稳定,是一种掩盖社会矛盾的表面的稳定。这种稳定,由于它是建立在对政治压力的一种恐惧和依附心理基础上,显然是不能长久的,不是真正的稳定。当社会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必然会冲出这种压力,那时,稳定就会转为动乱。正因为我们所要求的政治稳定是真正的稳定,故必须是与生动活泼相联系的稳定。

只有发展经济、适度民主才能稳定

稳定是任何国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之一。但在发展时期,政治不稳定因素高于发达时期和传统时期。如何克服发展时期的不稳定因素,实现政治稳定,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发展政治学所应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也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论断。他指出:发展经济,建设符合国情的适度民主,是求得我国政治稳定的关键。

为什么我国能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能在“六四”风波的冲击下而巍然不动?正如邓小平指出:“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③这就是说,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是取得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

邓小平为什么把发展经济对政治稳定的作用看得如此重要呢?这可以从发展中国家产生不稳定的原因中得到说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之所以有着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由于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速度大大高于传统时期,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格局迅速重新组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一是扩大了消费欲望与消费欲望满足之间的差距。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因经济发展之快而提高了,但由于新的生产力引起的消费欲望更大;而且由于发达国家的的生活方式通过电视等传播媒介的示范作用,使人们的欲望不仅超过了本人购买力,而且超过了本国的生产力,于是期望与现实脱离太远,人们的不满足感加重。二是经济现代化不仅扩大了阶级、阶层、地区、民族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而且打乱了原有的利益格局,新的暴发户与新的失落者同时出现,由此造成社会普遍的嫉恨与不满,即经济的不平等加剧导致了政治的不稳定。三是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现代化的推进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造成了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使大批农民、而且主要是易于激动的青年农民游离农村,走向城市,而城市一时又无法满足其就业的全部需要;同时在发展时期,因人口死亡率比传统时期大幅度降低,其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传统时期。因此,就业不足是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一个政权要想有稳定的秩序,首先要使人民安居乐业。无业可就,何以安居?这就不只是经济问题,它直接就是个政治问题了。

从这个简略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要想求得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首要的条件是发展经济。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就立于主动地位”^④;只要经济大力发展了,物质丰富了,就可以缩小消费欲望与消费欲望满足之间的差距;就可以促进后进地区赶上先进地区,逐渐使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因此可以化不稳定因素为稳定因素。

其次,邓小平还指出搬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合国情的民主形式,都不利于政治稳定。他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⑤他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⑥他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也强调,“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

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⑧而且指出,“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⑨因此,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⑩,“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⑪,“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的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⑫。

邓小平的这个关于我国民主建设的思想,不仅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也符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处在民主、法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处在从人治走向法治、从经验管理走向科学管理的过程之中。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因民主程度低、公民与政府的双向沟通渠道不健全、不畅通,不能完全满足由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教育的提高、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等等所增强的公民民主欲望与期待,因而埋下了政治不稳定的种子,需要用发展民主、建设民主以消除这些隐患。就我国而言,由于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民主形式也处在需要发展的阶段上。因此,我国也存在着民主的形式不能完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的矛盾,需要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积极性”^⑬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

但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如果建立脱离现实的民主形式,也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因为选择民主形式要受民主的生态环境制约。高度的民主形式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生产、生活达到高度社会化,交通条件、通讯条件十分发达,为人们了解全国政治信息、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二是公民有着参政能力所必须具备的教育程度、民主意识以及充裕的业余时间等等。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些条件均不充分、不完全。如果追求高层次的民主,必然会由于民主的群众基础差、根基浅,而被少数勇敢分子、野心家所操纵,为其个人政治野心服务,同样于政治稳定不利,甚至会因此酿成政治动乱。

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比较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一般而言,也不适宜采用多党竞选、三权鼎立的民主形式(现姑且不论它的实质是垄断资本的民主)。由于这些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特别需要加强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需要强化政府的权威,才能推进这些国家政治的、经济的改革,以逐渐克服这些矛盾;需要用团结、统一、权威去一心一意地努力发展经济,以摆脱贫困。因此,在这些国家,实行一党制,党、议会、政府三者能够合作的政治体制比较适合国情。事实也正是如此:许多亚非国家实行的是—党制。在这些国家凡是实行多党制的,其政治稳定性都不如实行—党制的国家。

因此,为了在我国求得政治稳定,结论只能是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⑭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202、265、237、176、178、348、284、360、113、268、252、371、377、240、244、220、220—221、194、196、284、178、285页。

⑬⑭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240页。